

涉外親屬間扶養事件之國際管轄權^{*}

——我國法、歐盟法及日本法之比較研究



作者文獻

陳瑋佑

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教授

摘要

鑑於扶養權利人與扶養義務人間地位強弱之落差，為平等保障扶養權利人接近使用法院之機會，我國家事事件法第125條第1項作為國際管轄權之規範基礎，明定扶養權利人住所地為親屬間扶養事件專屬之國際管轄原因，而未排斥同法第79條、第41條及第125條第2項、第104條第2項所設事件合併之關連管轄權，以及同法第6條第1項所認國際管轄合意。然而，相較於同樣以實現弱勢者保護為原理之歐洲扶養規則、日本家事程序法，我國法上開規範內容非無不明及不足之處。本文乃一面引介歐盟法與日本法，一面檢討我國法之現況，嘗試建構穩妥之解釋論。

目次

壹、序論

貳、比較法之觀察

參、我國法之解釋適用

肆、結論

壹、序論

一、國際家事管轄法上之扶養權利人保護

所謂扶養，係指一定親屬間有能力生活之人，對於無力生活者，各依其經濟能力及需要，給予必要之經濟上協助與支援（support and maintenance），使之適於生存¹。由於扶養權利人係仰賴扶養義務人之給付以

DOI：10.53106/1025593136701

關鍵詞：涉外親屬間扶養事件、國際管轄權、弱勢者保護、比較法、歐洲扶養規則、日本家事程序法

^{*} 本稿為作者執行臺灣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(NTU-114L7801)之部分研究成果。

¹ 參見陳棋炎、黃宗樂、郭振恭，民法親屬新論，修訂17版，頁438，2024年；戴炎輝、戴東雄、戴瑀如，親屬法，頁547，2021年；馬漢寶（賴淳良協助修訂），國際私法，四版，頁372，2022年；曾陳明汝（曾宛如續著），國際私法原理（續集），修訂三版，頁335，2012年；關於海牙公約、歐盟法等國際法文件之扶養概念，參見Andrae, Internationales Familienrecht, 5. Aufl., 2024, § 10 Rn. 5.

本檔案僅供試閱，完整內容請見本刊或月旦知識庫。

維生，一般係居於弱勢地位²，故其權利之確定與實現，尚不宜一律循民事訴訟法（下稱「民訴法」）或強制執行法（下稱「強執法」）所設程序為之，而應強化法院之職權，並謀求程序之簡速³。為此，我國家事事件法（下稱「家事法」）乃非訟化（未成年子女、夫妻間及其他親屬間）扶養事件之審判（家事法第98條、第104條第1項第1款、第125條第1項參照），並彈性化扶養費請求權之執行（同法第189條至第193條參照）。

其中，管轄規定係保護扶養權利人所不可或缺者，蓋如扶養權利人必須離去其所在地進程序，即可能因不堪負擔勞力、時間、費用而不得不放棄向法院尋求權利救濟；縱或不然，亦容易增加社會福利或社會救助之支出，而不免影響公共利益。此不僅在涉及本國各該轄區法院之管轄分配的情形為然，在涉及本國與外國法院之管轄分配的情形，鑑於遠赴他國請求、應訴之成本恆屬高昂，尤難期待扶養權利人能參與外國法院所行程序；相較於扶養權利人於土地管轄法上所應受之保護，其於國際管轄法上所應受

者，對於接近使用法院機會之保障，顯然更為重要⁴。正因如此，弱勢扶養權利人之保護，在國際上已成為國際家（民）事管轄法上之共識⁵。

而國際管轄法上保護扶養權利人之基本方針，應比照同屬弱勢者之勞工、消費者⁶，區分為（一）扶養權利人為請求人、（二）扶養義務人為請求人二者；在（一）之情形，應承認原告所在地管轄權（forum actoris），並維持扶養權利人之管轄選擇權，而在（二）之情形，則應回歸傳統之被告所在地管轄權（forum defensoris），並限縮扶養義務人之管轄選擇權，以盡可能使扶養權利人就近於其所在國提出請求或應對他方之請求。此外，基於當事人自治原則，雖無禁止締結國際管轄合意之理⁷，惟著眼於雙方談判磋商地位之不對等，在（三）扶養權利人與扶養義務人之國際管轄合意，亦應附加一定之限制。

二、問題之提出：家事法第125條第1項之（類推）適用

為平等保障扶養權利人接近司法即接近正義（access to justice）之機會，應針對涉外扶

² 參見2011年家事事件法第189條立法理由：「扶養債權人通常係屬經濟上弱者……」；Borrás/Degeling, Explanatory Report on the HCCH 2007 Child Support Convention, 2013, para. 364：「……〔扶養〕權利人一般係較為弱勢之一方」。

³ 參見沈冠伶，扶養請求事件之審判（上），月旦法學教室，166期，頁44，2016年；許士宦，家事事件法，二版，頁59-60，2023年。

⁴ 參照Fuchs, in: Internationales Familienrecht, 2019, Vorbem EuUVO Rn. 3 f.

⁵ 僅參見Borrás/Degeling, *supra* note 2, para. 452，氏並提及美國法上之特異立場；西谷祐子，人事訴訟事件及び家事事件の國際裁判管轄等に関する新法制（2・完），法曹時報，71卷4号，頁739，2019年。

⁶ 關於國際管轄法上之弱勢者保護法理於扶養權利人、消費者及勞工之共通性，參見Junker, Internationales Zivilprozessrecht, 6. Aufl., 2023, § 17 Rn. 15；關於國際管轄法上保護消費者之基本方針，參見陳瑋佑，涉外消費爭議事件之國際管轄權——我國法、歐盟法與日本法之比較研究，法律扶助與社會，14期，頁76-77，2025年；關於國際管轄法上保護勞工之基本方針，參見陳瑋佑，涉外勞動事件之國際管轄權——我國法、歐盟法與日本法之比較研究，法律扶助與社會，12期，頁4-5，2024年。

⁷ 參見Borrás/Degeling, *supra* note 2, para. 455.

本檔案僅供試閱，完整內容請見本刊或月旦知識庫。

養事件為國際管轄權之特別規定，已如上述（壹、一）；此在我國即指家事法第98條、第104條第1項及第125條第1項等規定：前一涉及夫妻間（婚姻中、離婚後）扶養事件之條文（第98條），明白準用家事法第53條，無疑係以國際管轄權為其規範對象，而後二分別涉及未成年子女、（其他）親屬間扶養事件之條文（第104條、第125條），不論依學說上頗為有力之「二重機能說」⁸，抑或晚近國際民事訴訟實務上逐漸確立而可援用至家事非訟事件之「類推適用兼法理說」⁹，亦均得為國際管轄權之規範基礎¹⁰，蓋未成年子女、扶養權利人之住所地或居所地作為管轄原因，係出於「便利未成年人使用法院及調查證據之便捷，以追求實體及程序利益」、「便利受扶養權利人使用法院及調查證據之便捷，以追求實體及程序利益」之理由¹¹，而此考量不僅適於分配土地管轄權，用於國際管轄權之分配，並無任何不妥之處。準此，我國法院得（類推）適用家事法第98條、第104條第1項及第125條第1項之規定，判定自己得否審判管轄所受理之涉外扶養事件（家事法第97條、第30條之1參照）。

果爾，則有待探討者，無非僅餘國際管轄權之規範內容：家事法第98條、第104條第1項及第125條第1項之規定，是否已滿足

弱勢者保護之法理？而鑑於家事法第98條所設國際管轄原因與同法第104條第1項、第125條第1項所設者差距頗大，又家事法第104條第1項與第125條第1項所適用之扶養事件亦有性質差異¹²，該三條文之解釋適用，宜區別予以討論。其中，就親屬間扶養事件而言，對照上述（壹、一）國際管轄法上保護扶養權利人之基本方針，可知家事法第125條第1項規定：「〔親屬間〕扶養事件，除本法別有規定外，專屬受扶養權利人住所地或居所地法院管轄」，有其不明與不足之處。

申言之，在（一）扶養權利人為聲請人的情形，家事法第125條第1項以其住所地、居所地為國際管轄原因，固有創設原告所在地管轄權之作用，如住所國與居所國並非同一，亦堪調增多扶養權利人之管轄選擇權，然同條賦予該等國際管轄原因專屬性（排他性），使我國法院無法基於扶養義務人住所地、財產所在地等位在我國而為審判管轄一事，則大幅減少扶養權利人選擇法庭地之可能。又在（二）扶養義務人為聲請人的情形，家事法第125條第1項以扶養權利人住所地、居所地為專屬（排他）之國際管轄原因，固有貫徹被告所在地管轄權之意義，然姑且不論扶養權利人之住所國未必係其最便於應訴之處所，倘我國法院得僅基於扶養權利人居

⁸ 關於二重機能說之基本架構，參見陳瑋佑，國際家事管轄法之比較研究——以未成年子女親權事件為中心，中研院法學期刊，25期，頁244-247，2019年。

⁹ 關於類推適用兼法理說之基本內容，參見陳瑋佑，再論國際民事管轄權之規範與解釋，台灣法律人，9期，頁133-134，2022年。

¹⁰ 同結論：劉鐵錚、陳榮傳，國際私法論，修訂六版，頁634、635-636，2018年；柯澤東（吳光平增修），國際私法，增訂六版，頁314、315，2020年。

¹¹ 參見2011年家事法第104條、第125條立法理由。

¹² 參見沈冠伶，註3，頁33-34：「未成年子女對父母之扶養請求，因有保護未成年子女利益之公益考量，不同於夫妻間或成年親屬間之扶養請求……」。

本檔案僅供試閱，完整內容請見本刊或月旦知識庫。